



HOME

首页

COMMUNITY

社会

LEARNING

学术

CULTURE

人文

IDEA

思想

BBS

中国收藏家论坛

当前位置： 首页 >> 人文 >> 人物 >> 正文



---请选择---

最新一期精选

>>更多

- “欧元之父”蒙代尔：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趋势
 - 利益平衡目标下的司法公正如何可能？
 - 吕思勉：博通周瞻，质朴恬淡
-
- 保留文明死亡的痕迹
 - 把哲学转化为生活方式

国内外科研动态

>>更多

- 同济大学举办第四届作家周活动
- 罗银胜传记新品签售会将在上海书城举行
- 学者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首届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在北大举行
- 山东省应用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基地揭牌

正确理解晚年恩格斯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存在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种思潮和流派。马克思、恩格斯自称共产主义者，并将自己的理论、从事的运动和为之奋斗的制度都称为共产主义，党叫作共产党。而那时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则属于资产阶级思潮和流派。马克思、恩格斯争取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但从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反对拿原则作交易。1871年后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容忍了“社会民主”这个用语，1874年后他们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但仍认为“共产主义”一词“更确切”，并坚持在正式场合使用它。恩格斯即使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写稿，也“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

一、《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第一卷的结论吗？

近期，学界有种观点先后引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股份制度的三段论述，从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马克思选集》1995年版第2卷，第519页），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断言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是一场和平“革命”；从股份公司内“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同上，第517页），宣称“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

《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基本上完成于1865年，在此前的四十年代，已出现布雷工人股份公司。马克思肯定“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又指出“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同上，第520页）。可见股份制只是把分离的私人财产，变为联合的由公司经营的财产。所谓“直接的社会财产”中的“社会”，德文有“社会”、“公司”两个含义，此处实为“直接的公司财产”，并非未来的全社会所有制，根本谈不上什么和平“革命”。

也正因为这样，恩格斯在这段话的后面加括号解释道：“自从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同上，第517—518页）。联系第三卷的“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再对比第一卷说的“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同上，第511、587、266、269页）；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前后是一脉相承的。所谓第三卷推翻了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不过是论者的一厢情愿。

二、恩格斯晚年到底有没有修改《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和策略？

某些观点对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取其所需，作出面目全非的解读。

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揭露有人“力图使自己和党

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问一下，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需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说像法、美、英那样的国家，“可以设想”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但德国是半专制制度，“这样的政策只能是长期把党引入迷途”。指出“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同上，第4卷，第411、412页）。表明晚年的恩格斯，同《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中“但愿”用和平的办法，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基本思想，是一以贯之，坚持到底的。

可是，有些观点却把恩格斯说的“可以设想”同德国拼在一起，写作：“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经过这样的变戏法，恩格斯对德国机会主义的严肃批判一字不见了。“可以设想”而后来条件变化从未出现过的“和平地长入”，竟被说成恩格斯对德国党的“具体指导”和在马克思逝世后“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的策略意见。这是多么严重的歪曲和颠倒！

某些观点认为，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这更是没有足够的根据。

《导言》高度评价原著对事变的叙述及其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仅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有了改变。其中“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说的是1848年二月革命发生时，大家以为它会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样不断上升，向前发展，以致革命失败了还期待不久会有新的高涨。1850年秋季马克思全面研究经济状况后，便永远抛弃了这种心理。历史表明，欧洲的资本主义当时“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的程度，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1848年想“一次”袭击就实现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以上讲的是对革命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属于对革命“过程”的看法。《导言》认为“这是我们所必需做的唯一重大修改”，而“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同上，第4卷，第507、509、510、512、508页）。论者却将“唯一重大修改”说成是对整个理论体系的修正。

“19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里的“斗争方法”，绝非论者加注解的“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而是说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斗争方法必须随着革命“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即由少数人带领群众、依靠街垒巷战、实行突然袭击，变为发动群众用暴力的、和平的各种手段，通过长期斗争占领各种阵地，由大多数人参加的、为大多数人的革命。但在坚持革命权的同时，更加注重“使用选举权”，开展合法活动，包括争取更多选民，利用国会同对手斗争，宣传和组织群众，以积蓄革命力量等。一旦反动统治者破坏合法性，在“决战的那一天”就要“放开手脚”，像罗马帝国的基督徒那样把法律从墙上扯下来，并放火烧毁皇宫。这是《宣言》说的“争取选举权”，最后革命夺取政权的“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的”运动的继续和发展。特别是《导言》重申“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重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经济改造公式。强调“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同上，第4卷，第510、523、525、508、521页）。所有这些，某些观点却把斗争策略的变化等同于革命道路的放弃，说恩格斯“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两者不仅大相径庭，而且是根本对立的。

三、恩格斯晚年是否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

某些观点摘引恩格斯1893年对《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断言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没有最终目标。这是无稽之谈。

请看原文！记者问：“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

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马恩全集》第2卷，第628—629页）前后文显示，是记者先提出“最终目标”，恩格斯才从没有“最终规律”和没有未来社会组织的“预定看法”这两层意义上，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这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放弃”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毫不相干。为使记者不误解为没有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恩格斯画龙点睛地谈到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它同《共产党宣言》说的“共产党人可以把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和他自己1887年说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使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马恩选集》第1卷，第286、307页，第4卷，第390页），前后是一脉相承的。

恩格斯1893年以后是否像某些观点说的不再提最终目的和最高理想了呢？不！

1894年出版的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一书中，就讲到德国共产主义者之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中间站”，始终“瞄准和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同上，第3卷，第248—249页）

1894年1月9日，恩格斯应某周刊之请，找一段题词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他回答说，除了《共产党宣言》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第4卷，第730—731页）

1894年1月26日，恩格斯撰文要意大利社会党实行《共产党宣言》的策略，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首要的伟大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产生失望情绪。而“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作是最终目的”。（同上，第4卷，第454页）恩格斯在这里不仅用不断发展论科学区分了“首要的伟大目的”和“最终目的”，而且阐述了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和“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重大意义。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导言》中说，1848年那时有的是许多宗派福音及其万应灵丹，“现在则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表述了最终斗争目标的理论”（同上，第4卷，第513页）。在这篇被当作恩格斯的“最后遗言”中，革命导师始终如一、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的理论，并称它为“明确表述了最终斗争目标的理论”。而某些观点却视而不见，说恩格斯早已“放弃了”最高理想，甚至修正了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并把这些不实之词说成是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得出的结论。如此撰文治学，只能让人想起一句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四、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吗？

当前出现的某些观点使用的论据和材料，许多都来自伯恩斯坦的著作。

近期出现的以上观点，总的是要说明马恩晚年修正了自己，恩格斯修正了马克思，两人都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而经过我们查对和辨析，没有任何一条站得住脚，因而其结论不能成立，是强加的。那么，论者上述奇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大家知道，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共产党宣言》标志科学共产主义的问世，《资本论》为它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恩格斯晚年坚持和丰富了这个理论。他1895年8月5日逝世后不久，伯恩斯坦就借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诋毁马克思的理论“过时”并公开进行系统的批判、修正，重点攻击由这两部书阐明的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替代的根本道路。近期出现的相关观点也是围绕这两部书，在替代的必然和道路这个基本问题上大做文章；连使用的论据和材料，许多也来自伯恩斯坦的著作。例如，论者说的有了股份制，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和平“革命”，它来自伯恩斯坦认为信用特别是股份公司的发展，造成了资本的“民主化”，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生长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论者说的恩格斯的《导言》修改了《共产党宣言》的策略，它来自伯恩斯坦抓住只言片语，宣称《导言》是其修正主义思想的理论依据，以及他认为

资产阶级民主制可以使无产阶级通过普选和议会掌握政权，“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是布朗基主义的残余。论者说的恩格斯“放弃了”最高理想，最终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它直接来自伯恩斯坦的“最终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并诋毁马克思一涉及党的最终目的，就为了“教义”而牺牲科学，等等。如果从这一层面上说，这些观点在理论上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而是拾人牙慧，包括照搬这些年来国际上的恩格斯“修正”马克思一类怪论，不过是世界社会主义严重挫折时的沉渣泛起而已。

革命导师不仅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摒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且对民主、对社会主义总是坚持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

然而伯恩斯坦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者”。他要求社会民主党成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他的修正主义后来为各种社会改良主义政党所传承，并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论者为给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翻案，竟说马恩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和最高成果。有点理论和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存在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种思潮和流派。马恩自称共产主义者，并将自己的理论、从事的运动和为之奋斗的制度都称为共产主义，党叫共产党。而那时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则属于资产阶级思潮和流派。马恩到处争取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但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反对拿原则作交易。1864年德国拉萨尔派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恩格斯就说“这是多么糟糕的名字啊！”随后相继有人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不可分割或从先民主革命再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1871年后马恩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容忍了“社会民主”这个用语，1874年后他们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但他们仍认为“共产主义”一词“更确切”，并坚持在正式场合使用它。恩格斯即使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写稿，也“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1887年他说，“共产党人”，这是“我们当时采用的、而且在现在也决不想放弃的名称”（同上，第4卷，第395页）。直到晚年，他还谈到“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马恩全集》第22卷，第489、490页）。革命导师不仅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摒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且对民主、对社会主义总是坚持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从不抽象地、一般地谈论民主或社会主义，更不认为两者是各个阶级、各种制度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某些观点将毕生严格区分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马恩扣上“民主社会主义”的帽子；将同伯恩斯坦作坚决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恢复了党的正统名称——共产党的列宁扣上“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将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成“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如此历史颠倒，是非混淆，要“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障碍，这是不是高估了自己这些“家”们、“长”们的能量，低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意愿与毅力？1989年西方某政要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及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办法。论者这般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要将千百万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和平”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这种人家自己也承认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究竟是在实现谁的战略？

作者：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钟哲明



友情链接

请选择



Tel. + 86 - 21 - 59575000 59568566 59568200
网站内容归上海社会科学院版权所有
沪ICP备05018181号



沪ICP备
05042248

网站地图

关于我们